

分类号:

密级:

兰州大学

研究生学位论文

当代中国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论文题目(中文) ——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调查报告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论文题目(外文) support: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fluencing
factors

研究生姓名 尚梦媛

学科、专业 法学·社会学

研究方向 城乡社会发展

学位级别 硕士

导师姓名、职称 冯世平 副教授

论文工作

起止年月 2013年5月至2014年5月

论文提交日期 2014年5月

论文答辩日期 2014年5月

学位授予日期

校址: 甘肃省兰州市

当代中国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的调查报告

摘要

代际支持是老年人获得帮助的重要来源，也是家庭社会学、老年学、人口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研究以笔者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所获得的翔实数据为基础，采用频次描述、交互分类、逻辑斯蒂克回归等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当代家庭日常生活照料的代际互动的现状，并用逻辑斯蒂克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计算了社会人口特征，家庭结构等因素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笔者通过回顾文献，以社会交换论和合作社/互助理论为理论视角，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了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影响因素，并对两种理论的解释力进行了验证。

结果表明，老年人的年龄，收入，子女的性别，子女数量，居住距离，以及老年人提供支持的方面对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的照料支持有显著影响，并证实了两种理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当代家庭代际支持关系中，是一种短期交换的互惠和长期利他互助共存的关系。

关键词：代际支持，日常生活照料，logistic 回归

**PIRICAL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URVEY OF THE ELDERLY CARE
FOR DAILY LIFE**

Abstract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help for seniors, and family sociology, gerontology,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demographic research.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of the basis of detailed data, the frequency of description, interactive classification, logistic regress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s, such as.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family to take care of the daily life of the status quo of intergenerational interaction with logistic regression statistical analysis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ctors such as family structure on the influ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he literature is reviewed, and the author through to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cooperative/mutual aid theory as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some research results.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elderly care for daily life support,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wo theories are verifi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derly age, income, children's gender, number of children, to live, and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elderly has remarkable effect on daily life care support and proved both theory has a certain extent, in contemporary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relationship, is a kind of short-term exchange relationship of mutual benefit and long-term altruistic mutual coexistence.

Key word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Care for daily life, Logistic regression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现实的问题.....	1
一、养老负担的加重.....	1
二、社会变革使得家庭养老问题复杂化.....	2
第二节 理论背景.....	3
一、国外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	3
二、国内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	8
第三节 文献评述.....	12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意义.....	13
第五节 本文的框架结构.....	15
第二章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假设.....	16
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16
第二节 理论假设.....	17
第三节 基本变量和测量.....	19
第三章 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21
第一节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21
第二节 相关关系的描述.....	26
第四章 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回归分析.....	33
第一节 Logistic 回归模型.....	33
第二节 统计分析结果.....	34
第五章 结论与讨论.....	58
第一节 结论.....	58

第二节 讨论.....	59
参考文献.....	60
学术成果.....	65
致 谢.....	66

第一章 导论

中国古代的《孝经》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孝”是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它强调子女对父母赡养的义务，强调在父母年老时，子女要为父母进行生活上的照顾，这建立了传统家庭代际支持的舆论监督系统。老年人社会保障和生活照顾的需求主要是靠家庭成员提供的支持来满足(Hong and Tracy, 1999; Whyte and Parish, 1984)，子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支持的主体(shi, 2002)。但随着改革开放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年轻一代通常受过更好的教育并具备了更多的现代化技能，这使得他们能够在新的社会时代占取更多的优势(Parish and Tang, 1997)，而老年人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也由此可能被削弱。在这些社会变革中，家庭中传统的代际支持模式是否发生变化？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本章主要围绕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

第一节 现实的问题

一、养老负担的加重

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人口结构和社会形态急剧转型的时期。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中国人口老龄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速度(Riley and Gardner, 1997)。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7594440人，占总人口的13.32%，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927158人，占总人口的8.9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 2011)。生育率的下降和老年人口的比重增多，这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养老负担加重。例如，在1998年，中国每一个老年人(60岁以上)有超过六个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15至59岁)来供养，到2040年，每一个老人只会有两个达到工作年龄的成年人来供养(联合国1999)。这使得养老问题日益凸显。

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家庭养老依然是解决养老的主要方式，子女的行为在其中有着十分显著和重要的影响(姚远, 2001)，家庭养老就是子女为老人提供支持的问题。子女为老人提供的支持对解决养老问题，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身体和生命历程的变化(如身体机能的衰退以及从生产劳动市场退休)老年人需要各种支持，包括当他们不再工作时的对金融支持的需要和当身体机能开始衰退时的对工具性支持(日常生活的照料)的需要。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

类型的支持可以从各种渠道获得,但在中国大多数老年人接收支持来自他们的成年子女(Pei and Pillai 1999; F. Yuan 1990)。目前,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基本上所有年老体弱的老年人都是依靠子女或其他亲属提供日常生活帮助和个人护理(Ikels, 1997);尤其在农村地区,子女提供的代际支持几乎构成了老年人社会支持的全部内容(Shi, 1994)。

二、社会变革使得家庭养老问题复杂化

随着改革开放,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到整个社会发生的巨大变革,使得现代家庭规模、结构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支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体现在:第一,家庭规模和结构的向小型化、核心化趋势转变。这种转变凸显了夫妻及与其未成年子女间的紧密关系,淡化了父母与儿子儿媳之间的关系(宋璐,李树茁,2011),代际关系的中心由亲子轴转向夫妻轴;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多年的大力推行,催生了1亿左右的独生子女家庭(风笑天,2011),子女的唯一性,导致代际重心向下倾斜,“尊老不足,爱幼有余”(关颖,2010);这也导致养老资源不足,子女数量的减少使得抚养比重增加,有人认为,“421”甚至“8421”的家庭结构让曾经最享福的独生子女一代将背上“养老奴”的枷锁(王辉,2011);第三,过去二三十年形成的超过2.2亿的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极大地冲击了家庭养老功能,人口流动拉大了亲代与子代的居住距离,父母难以保证子女在身边侍奉养老(刘汶蓉,2012),原先控制家庭资源的父母失去了对子女的控制权,这造成家庭对其老年人持续供养的能力可能发生变化(Joseph and Phillips, 1999),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印度尼西亚(Kreager, 2006)和孟加拉国(Kabir, Szebehely etl, 2002);第四,“劳动力市场的日趋激烈竞争降低了子女供养父母的能力,却加深了成年子女对父母经济和劳务帮助的依赖。在社会保障体制和社会服务体系依旧不健全的情况下,家庭是当前中国人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保障网络,但在离婚率上升和兄弟姐妹数量下降的情况下,青年人能获得的家庭支持资源越来越集中在父母身上。在城市父母拥有退休金和身体健康状况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成年子女对父母的物质依赖尤其明显。(刘汶蓉,2012)第五,在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以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性,倡导平等与自由理念为基本点的个体主义和强调自我实现的价值观不断发展的今天,平等、民主、自由日益成为主流话语。在这个过程中,青年人获得了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¹的话语权。同时,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拉大了代际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差距,导致年轻人与父母共同居住、和睦相处的困难加大。

“虽然社会和文化规范仍然保持着家庭对老年人的赡养”(宋璐,李树茁,

¹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应用心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011),但是以上种种问题的产生与积累进一步使家庭养老问题复杂化,家庭的赡养功能实质上已经受到削弱。在这一背景下,了解当代家庭中子女对父母提供的支持的现状,探究影响子女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帮助的原因,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节 理论背景

代际支持是社会学,老年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本文主要从定义,相关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的不同议题几个方面对国外国内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

一、国外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

(一) 国外关于代际支持的定义

1、国外学者对代际支持定义

根据韦伯斯特大学生词典(webster Collegiate Dictionary),“支持”是“指一种推动、协助、帮助或支持某事发生的行动或过程”(转引自阮曾媛琪,2002)。在英文文献中“代际支持”是“代际援助”和“代际转移”的同义词(David C.Ribara, Mark O. Wilhelm b, 2006)。有学者将代际支持定义为:指单个家庭内部父代与子代或者孙子代之间,包括社会财富等经济资源及劳务等非经济资源在内的资源的代际间的流动(Morgan and Hiroshima, 1983; 转引自王丽静,2012)。

2、国外学者对代际支持类别划分

国外有学者将代际支持划分为实用性支持(Practical support)和情感性支持(emotional support)(Marieke Voorposteland Rosemary Blieszner, 2008)实用性支持指家务事和家里的琐事方面给与的帮助,情感支持是指给予建议或是关心其他人。也有学者将代际支持划分为:货币支持,实物援助,日常活动的帮助(Rongjun Sun, 2002)。有学者认为代际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工具性支持(帮助做家务或看护孩子)和情感性支持(倾听他人的担忧和想法)(Lei Lei, 2013)。也有学者认为代际支持指工具支持(日常生活的帮助)和金融支持(Zachary Zimmer and Julia Kwong, 2003)。

(二) 国外代际支持的相关理论

总体上讲,国外研究代际支持的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 (social exchange theory), 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 该理论通过交换概念发现社会资源分布的不平等和由此产生的权力地位的分化, 并从各个权利层次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中找到社会系统发展、变迁的动力。认为社会上的多种非经济关系为交换关系, 社会交换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社会交换行为是个人以期待回报和换取回报为目的的活动。它建立在交换双方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发生在关系密切的群体或社会中。不同于一般的交换行为, 在社会交换中, 没有统一的衡量标准, 报酬的价值具有相对性、模糊性。个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为了获取满足自我需要的社会资源, 就必然有所付出, 人们正是通过“支付——回报——再支付——再回报”的连续社会行动过程, 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许多的关于代际支持的实证研究都发现了两代人之间存在这种交换关系 (Bernheim et al., 1985; Bengtson et al.1990, Eggebeen and Davey, 1998; Lee et al, 1994; Szinovacz, 1997)。

2、角色模范社会学习理论

角色模范社会学习理论 (Socialization and social learning theory) 该理论强调父母自身的言行举止对他们孩子的模范力量。在对代际支持的解释中, 他强调这一代人对其父母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行为, 对他们的下一代来说是一个模范, 强调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这种模范的力量 (David C. Ribar, Mark O. Wilhelm, 2006)。强调在教育孩子行为时模范作用的重要性 (Bandura, 1976), 经常和父母及亲属保持定期的, 长期的亲密关系的孩子更加受这个模范作用的影响。而且, 众所周知模仿一个模范的帮助行为在亲社会行为发展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Eisenberg and Fabes, 1998)。

3、合作社/互助理论

合作社/互助理论模型 (corporate group/mutual aid model) 融入了家庭成员的情感因素, 更贴近家庭现实。该模型认为代际之间存在的利益共同性和相互默认的契约是长期的、跨越时间的。他将家庭视为一个密切相关的网络, 关心所有家庭成员的福利并在家庭网络中寻求最优资源的分配 (Lee, Parish, and Willis, 1994)。Becker 认为这种模式中利他主义的精神在家庭成员之间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Becker, 1974)。这种理论表明利他动机将代际转移归结于转移接受者的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的需求 (Altonji, Hayashi et al., 1992), 中国家庭一直被描绘成一个合作式的亲属团体, 由有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的成员组成并且即使家庭成员不在同一个家庭生活也被共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Greenhalgh, 1985; Tu, Freedman and Wolf, 1993)。

4、权力与协商论

权力与协商论(power and bargaining model), 认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年长父母对经济、训练与知识等资源的控制下降, 其权威因此大为削弱, 他们从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处可获得的支持也因之而减少。该理论认为, 父母从子女或家庭其他成员处获得支持的程度与其对资源(如财产)的控制有关。

由以上四种理论可以看出, 角色模范社会学习理论, 他强调代际支持行为的模范作用, 它更适合于同时分析三代人之间的代际关系; 权力与协商理论, 强调的是老年人作为长者他在家庭中对资源(财产、收入等)的控制, “但是, 在中国, 传统社会中父母被赋予的至高权利(即, “父权”)在一次次革命浪潮中从思想上和物质上被削弱,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公有化运动取消父权赖以生存的土地或其他资产私有制, 中国老年人资产所有权的杠杆作用就不那么突出了”(李树茁, 2011), 但即使如此, 最近的研究表明, 家庭内部长辈权威的减弱并没有导致中国现代家庭养老方式的重大变化(陈皆明, 1998), 由此可见这种理论对解释中国的代际支持不适用。社会现象是复杂的, 所以对代际支持的解释也可能不是一种理论就足以阐述清楚的。由此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从社会交换论和合作社/互理论两种理论视角出发, 对影响当代家庭代际支持的因素进行探讨。

(三) 国外代际支持研究方法

国外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居多, 主要探讨代际支持获得和给与的动机、原因及理论解释。(Agree et al. 2002; Agree, Biddlecom and Valente 2005; Biddlecom, Chayovan and Ofstedal 2002; Frankenberg, Beard and Saputra 1999); 定性研究的较少, 主要探索老年人和中年成年人对于同住的态度, 家庭成员的义务和所能感受到的关爱(Michele Sinunu & Kathryn M. Yount & Nadia Abdel Whab El Afify; Akiyama, Antonucci and Campbell 1997; Caffrey 1992; Ingersoll-Dayton and Saengtienchai 1999; Knodel 1995; Mehta 1997a, 1999; Ngin and DaVanzo 1999; Teo and Mehta 2001)。

(四) 国外代际支持的议题

1、提供代际支持的动机研究

(1) 基于互惠的动机。认为, 孩子们为父母提供支持的动机是将这种行为看做一种回报, 意味着帮助行为出于遵守, 一个内化了这种要对给你提供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的义务(Gouldenr, 1960)。这种情形下, 互惠是对提供帮助的行为寄予了回报的可能, 因而这种适用于短期内的, 立即的交换行为。相比之下, 对于长期的互惠行为, 就像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一样, 有很好的持久性的特点。这

意味着“没有确切的对代际支持的付出期望回报…”这种想法能在长期内平衡自己(Wentowski, 1981)。这种长期的互惠更适合描绘代际之间的给与和获得支持,就像一个人对孩子提供支持就像是在“支持银行里”定期“存款”以期到期老了的时候能获得回报(Antonucci and Jackson, 1990)。

(2) 基于依附动机。这种动机将提供代际支持的动机归结于与一个人的关系的亲密程度和出于爱的感情,有研究认为这种亲密程度和出于爱的感情对提供支持的数量有着明显的影响作用(Bengtson and Roberts, 1991; Lawton et al, 1994; Parrott and Bengtson, 1999; Silverstein et al, 1995; Stein et al, 1998)。

(3) 基于义务动机。认为提供支持是由于个人内化了社会规范的作用。孝顺的义务是一种规范(Bengtson et al, 2003; Lee et al, 1994)成年子女为其父母的提供支持和帮助的动机是基于认为为其父母提供帮助和照顾老人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Cicirelli, 1993)。

(4) 利他主义的动机。认为,家庭中提供帮助的动机只是出于家庭成员的需要(Cicirelli, 1993; Bengtson et al, 2003; Lee et al, 1994; Parrott and Bengtson, 1999)。

2、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

(1) 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个体特征与提供和接受代际支持之间的关系是一些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人们的个体特征会对代际支持产生影响(Komter, 1996; Brody, 1990; Rossi & Rossi, 1990),已有的研究有:

①Mahmoud Ghazi-Tabatabaei·Zeinab Karimi 在伊朗的调查,研究了社会结构和社会人口特征对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经济和工具性支持三方面的影响。结果显示性别对代际支持有明显的作用母亲和父亲在代际交换模式中存在明显差异。母亲往往在给予和接受支持方面都要比父亲多。女儿和儿子在与父母的支持行为也有所不同。儿子比女儿更多的为父母提供支持,代际支持中的互惠仍然存在(Komter, 1996; Brody, 1990; Rossi and Rossi, 1990)。

②Hogan, Eggebeen and Clogg 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特征对代际支持有影响。在贫困的家庭里,代际交换的力度较低(无论是给与还是接受),但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相比,他们往往接受的支持多于给与的支持。同样的其他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社会经济资源而不是社会规范种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对代际支持产生影响(Berry, 2001; Lee, Netzer and Coward, 1994; Lee and Aytac, 1998; Sarkisian and Gerstel, 2004)。个人的社会经济资源,如较高的收入或者教育程度会促进代际的交换,而贫困和不健康的身体状况会减少对代际支持的提供(Eggebeen and

Hogan, 1990)。

③许多的研究发现,老年人能否得到子女的生活照料则往往决定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shi, 1993),许多对东亚国家地区的研究证明,子女对老年父母的代际支持会随着老人因丧偶、经济状况下降、健康状况恶化,死亡风险上升等原因而导致的对外界帮助需求的增加上升 (Hermalin, Ofstedal et al, 1996; Rogers, 1996)。

④种族与代际支持的研究,有学者研究证明,不同种族的文化差异对代际支持的互惠有影响 (Lee, Peek and Coward, 1998)他们发现,黑人对孝顺的责任高于白人,在美国黑人比白人有更强的亲属网络,在非正式支持系统中的家庭支持比起白人保持较高的水平 (Mutchler, 1999; Schans and Komter, 2006)。

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会对代际支持产生影响 (Loism.verbrugge and angelique Chen, 2008; Zachary zimmer ang Julia kwong, 2003)。

(2) 家庭结构对代际支持影响

①Zachary zimmer and Julia kwong(2003)对中国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子女的数量对代际支持有着显著的影响效果。拥有较多的孩子增加了从孩子那获得支持的机会。然而,存在差异,这取决于支持的类型。每个额外的孩子的增加,引起工具性支持获得的收益递减。相比之下,获得经济支持的概率呈线性增加。支持的量可能和孩子的数量是更加线性相关的 (Chi and Hsin1996)。

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居住距离也是影响代际支持的重要变量 (Eggebeen and Hogan, 1990; Hoyert, 1991; Montgomery and Hirshorn, 1991)。

总之,国外代际支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他们的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指标选取和分析技术等方面,对我们展开研究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由于社会制度,文化差异等原因,国外与我国的家庭人际关系有不同之处。国外的研究成果在我国还有一个适用性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成果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科学验证,同时,社会现实瞬息万变,对家庭中人际关系起影响作用的因素也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些都表明对国内代际支持行为开展进一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二、国内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

国内关于代际支持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虽不如国外的相关研究如此卷帙浩繁,但也取得了很多成果。在查阅中国知网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学术辑刊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论

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特色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中输入“代际关系”关键词，从1978-2013年共得到的文章条目为2453条，从中筛选出与代际支持研究相关的文章共230篇，从1978-2013年代际支持研究的文章条目整体呈增多趋势。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 从研究视角来看：一是从养老需求的满足和养老资源的供给两方面的互动对代际关系做出解释(张友琴, 2001; 张文娟等, 2004; 杜鹏, 2004; 王树新, 2004; 贾云竹, 2005)。二是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代际关系, 认为, 社会及家庭结构等的改变使得代际关系发生变化, 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家庭规模缩小和生育率的降低是影响家庭提供养老支持的重要因素(阎云翔, 1996; 郭于华, 2001; 高和荣, 2003; 王树新, 2004)。三是从文化变迁的视角来理解代际关系(陈彩霞, 2000; 王义才, 2000; 姚远, 1998; 穆光宗, 1999)

2. 从研究的对象来看: 有的学者关注农村代际支持(郭于华, 2001; 贺雪峰, 2008; 阎云翔, 2006), 有的学者关注城市代际支持(车茂娟, 1990; 边馥琴, 1993, 边燕杰, 1998); 有的学者综合两方面关注家庭的代际支持(郭志刚, 1992)

(一) 国内关于代际支持的定义

1、国内对代际支持的定义

国内对代际支持概念的理解, 是从代际关系的概念入手。代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从广义的角度说, 是就宏观社会而言, 指社会层面上因地缘、业缘和其他关系产生的不同代际之间的交往关系; 从狭义的角度说, 是就单个家庭内部而言, 指家庭中因血缘和姻缘而产生的关系, 即亲代与子代的关系。涵盖的内容十分丰富, 包括物质与精神, 经济与文化等诸方面(董之鹰, 2002)。

代际支持是从狭义的代际关系考虑, 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家庭的其他成员为某个人(如父母)所提供的帮助(刘爱玉, 杨善华, 2000)。代际支持主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与情感支持(穆光宗, 1998), 同时这种支持可以是双向的即可以从子代流向父代也可以从父代流向子代(李树茁, 2003; 张文娟, 2005; 王萍, 2011)。代际支持是一种双向的代际交换, 即包括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 也包括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经济帮助和家务、照料未成年子女等日常生活帮助(宋璐, 李树茁, 2011)。

2、国内学者对代际支持类别划分

国内学者基本上都认为代际之间的帮助可以分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三部分(刘爱玉, 杨善华, 2000; 李树茁, 宋璐, 2011)。经济支持包括两个方面, 金钱上的支持和物质上的支持; 生活照料, 包括身体照料和家务料理,

情感支持，主要指当老年人(如父母)需要讨论个人问题或有重要的事需要商量、给与建议或帮助时能不能得到子女或家庭中其他成员的支持。

(二) 关于代际支持的理论

国内关于代际支持的理论一类是运用西方代际支持的相关理论(社会交换论, 权利与协商理论, 合作社/互助理论)进行的研究。社会交换论强调交换的双方都拥有一定的资源并从对方换取好处。权利与协商模型认为由于子女害怕失去物质资源的转移和继承权, 控制有价值的资源(例如工作、商业资产、股票和土地)的老年父母处于要求子女顺从的地位。合作社/互助模式出于利他主义动机, 强调家庭的整体性和成员的利他行为准则。无论回报与否, 家庭内最需要帮助的人(通常是年长者)得到的支持最多(李树茁, 宋璐, 2011)。

另一类是结合了中国的实际, 有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费孝通(1983)提出了解释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论”又称“抚养——赡养”模式。以及依据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养老的影响而提出的“责任内化论”(张新梅, 1999)。虽然学者把中国文化中与家庭养老相关的孝道价值观念细分为若干理论, 但由于家庭代际关系依赖于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经济条件, 这些分类实质上是刻画了代际支持的多个层面和侧面。

(三) 国内代际支持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来看对代际支持的研究有学者采取调查研究的定量研究, 这一方面主要是对西方理论适用性的检验, 以及探讨当前代际支持的现状和原因(郭志刚, 1996; 徐勤, 201; 王世斌, 申群喜, 余风, 2009, 熊跃根, 1998; 王树新, 马金, 2002; 杨善华, 贺常梅, 2004; 杨菊华, 李路路, 2006; 刘爱玉, 杨善华, 2000)。还有学者用个案研究, 访谈等定性研究的方法对家庭代际支持的传统文化价值基础进行探讨(陈柏峰 2008; 郭于华, 2001; 贺雪峰 2009; 周晓虹, 2000)也有少数学者从文献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王跃生, 2008; 姚远, 2008; 穆光宗, 1999; 刘桂莉, 2005)

(四) 代际支持的不同议题

1、对西方代际支持模式的适用性验证

有学者对西方的代际支持的社会交换论以及权利协商模式和合作社/互助理论适用性验证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代际支持的理论并不适合于分析中国家庭的代际关系(刘爱玉、杨善华, 2000)。但有些学者研究认为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代际支持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熊跃根, 1998; 郭于华, 2001)。利他性和交

换行为同时存在于家庭的经济交换中 (Secondi, 1997)。子女的经济支持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产生的, 合作社/互助理论能够更好的即使子女的支持行为 (Lee 和 xiao, 1998)。

2、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影响作用的研究

宋璐, 李树茁, 研究了农村老年人代际交换对其健康状况影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情感交流都有利于其健康状况, 但子女对其生活照料增加则对其健康状况不利 (宋璐, 李树茁, 2006)。

王萍, 李树茁, 考察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王萍, 李树茁, 2011)。

还有学者对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认知功能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张文娟, 李树茁, 2004; 高蓓, 2011)

3、代际支持现状的相关研究

当前家庭代际支持现状研究, 学术界主要是集中在代际支持的重心、支持量上的研究。一种观点认为: 目前家庭代际支持出现严重的代际倾斜, 家庭的代际支持以子女为中心, 老年人给与的支持多于他们获得的支持, 代表性的观点有: 转型时期, 中国家庭传统的代际支持关系被打破, 出现了代际支持重心下移的倾斜现象 (刘桂莉, 2005)。现代中国的城市家庭, 出现了‘反哺模式’的新型赡养关系 (车茂娟, 1990)。中国代际关系“抚育——反哺”的反馈模式将被打破而走向更理性、更少亲情的新型平衡关系 (贺雪峰, 2007)。还有学者研究发现: 老人的潜在逻辑是哺育和反哺传统不可变更, 而且要求后代无条件予以回报, 但后辈人的逻辑更看重交换的全部内容, 他们愿意做出有条件的回报 (郭于华, 2001)。上下两代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理性, 更具自我利益的意识, 两代人之间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中的交换关系 (阎云翔, 2006)。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子代在养老行为的逻辑开始走向理性化 (范成杰, 2013)。

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 代际支持仍然是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为主, 代表性的观点有: Logan, J. 和 Yanjie Bian 基于对城市的抽样调查, 其研究发现: 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经济往来和日常照顾大多是从子女向父母流动的, 子女给与父母的经济资助和日常生活照料的频率和数量远高于父母对子女的帮助 (Logan, J. and Yanjie Bian, 1998)。也有学者研究发现: 我国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经济收入来源仍然是以子女或亲属供养为主 (杜鹏, 武超, 1998)。在经济照顾

上主要以儿子的支持为主，女儿对父母的照顾体现在日常生活照顾上（熊跃根，1998）。中国传统的子女养老的反哺模式的互惠在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子女供养老辈仍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郭志刚，陈功，1996）。农村老人与子女代际间的经济与劳务方面的交往十分普遍，代际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代际交往的基本模式没有改变，依然是以子女支持老人为主，老人帮助子女为辅（徐勤，2011）。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是农村老年群体的重要经济来源，在家庭养老支持中，农村成年子女更突出经济支持供给（胡仕勇，刘俊杰，2013）。

4、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研究

对于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社会人口统计变量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宋璐，李树茁，研究了农村老年人代际交换对其健康状况影响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交换有着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在经济支持方面女性老年人比男性老人给予子女的帮助少；在生活照料方面女性往往获得较多的支持，同时她们也会向子女提供较多的生活照料（宋璐，李树茁，2006）。

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程度也是对老年人获得支持有显著作用的一个因素，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老年人能够从子女或其他亲属那得到较多的身体照料和家务支持（刘爱玉，杨善华，2000）；对健康状况较差、丧偶的老人来说，子女（尤其是女儿）是主要的照料者（熊跃根，1998）。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老年人年龄，婚姻状况等社会人口特征探讨影响代际支持的因素（刘爱玉，杨善华，2000；熊跃根，1998；杨菊华，李路路，2006）。

（2）家庭结构因素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居住模式会对代际支持产生影响。家庭成员（尤其是代际之间）的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表现之一。在东亚国家，居住模式对家庭生活会产生重要作用，地理上的距离会减弱代际之间的日常生活照顾，但是经济支持可以跨越地域的局限，可以在相距千里的亲子之间运作。有时可能与父母离的较远，子女（主要是儿子）因为自己不能亲自照料父母更有可能通过经济支持来补偿对父母生活照顾的不足（杨菊华，李路路，2009）。居住情况是了解老年人生活状况和照料需求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它可以从居住的房屋类型、质量等等外部情况以及家庭中所住成员的结构两个方面来考察（熊跃根，1998）。居住距离对代际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张文娟，李树茁，2005）。

周律, 陈功, 徐铭蔚, 王佳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视角, 按子女的性别和孩次, 探究时间转移的动机。研究结果显示从父母的视角分析, 子女的孩次对代际时间转移动机有显著地影响, 而子女性别的影响不显著(周律, 陈功, 徐铭蔚, 王佳, 2012)。

(3) 文化和价值观对代际支持的影响

认为传统文化的作用对代际支持有影响。认为代际支持发生的严重代际倾斜的研究将这归结于传统的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所致(刘桂莉, 2005; 贺雪峰, 2008; 陈柏峰, 2009); 而另外一种认为代际支持没有发生倾斜的研究也将这归结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王萍, 李树茁, 2011; 杨菊华, 李路路, 2009)。

以上都是从微观层面对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关注, 还有学者从宏观层面上考虑影响代际支持的因素, 认为这是国家力量的作用(郭于华, 2002)。也有学者认为这是社会变迁改变了社会结构, 以及现代化建设及随之而来的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给传统家庭代际支持关系造成了冲击(刘桂莉, 2005; 张文娟, 2009)。

第三节 文献评述

现有的国内的代际支持的研究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研究视角, 理论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是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仍有以下几点不足之处:

1、关于西方的代际支持的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关系的适用性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西方代际支持的理论缺乏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等主观因素的考虑, 因而他们认为西方的代际支持理论对于分析中国家庭的代际支持没有很强的解释力(刘爱玉、杨善华, 2000; 贺常梅, 2004; Hong and liu, 2000)。但也有研究表明利他性和交换行为同时存在于家庭的经济交换中(Secondi, 1997)。Lee 和 xiao 研究了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中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 认为子女的经济支持是基于老年人的需求而产生的, 合作社/互助理论能够更好的即使子女的支持行为(Lee and xiao, 1998)。Sun 分别从子女和父母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当代城市家庭中的经济交流、生活照料等活动, 研究发现, 合作社/互助模式能够更好的解释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换活动。因而对西方代际支持的理论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2、当前关于成年子女与父母的代际支持现状研究中所得结论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 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供养并没有遵循传统的代际关系, 成年子女并没有成为给与父母支持的一方, 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 成年子女给与父母的支持

少于从父母那里获得的支持（刘桂莉，2005；郭于华，2002，阎云翔，2006，范成杰，2013）。而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代际支持关系仍然是一种以子代支持亲代为主的关系，遵循了子代赡养老年人的传统的代际关系（郭志刚，1992；杨菊花，李路路，2006）。由此可见在当代家庭中代际支持还有值得继续讨论的地方。

3、对代际支持的研究，接受和给予支持往往是独立的主题，而且学者往往以关注的是老年人获得支持的方面，老年人对子女提供支持的方面研究较少，但代际支持是互动的是双向的（姚远，2001），现有文献缺少将二者同时考虑的视角。

4、已有的研究中，很多研究将代际支持作为自变量考虑，如将代际支持看做对老年人身心健康，幸福感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或者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考虑影响代际支持的因素，缺乏系统的探讨代际支持获得与提供的影响因素。

5、已有的研究中，研究的范围较小，大多是基于某个省或某几个省的研究（安徽，山西，天津，河北）等中东部地区为主，由于我国国土面积大，东西部地域差异大，再加之西部地区也是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如果所得结论只是鉴于中东部的某几个地区所得的资料而来，其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

基于以上的文献回顾，本文运用全国性的大型调查数据，对相关的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检验，从父母与子女双向度的视角考察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关系，并对影响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第四节 研究的内容、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的内容

代际支持是家庭社会学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的研究关注的是子女对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单向的代际支持的探讨，很少有研究将父母提供与获得同时考虑，也没有系统的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范围较小。本文利用全国范围内的数据，从父母和子女的双向度视角来考察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的互动，本文所关注的首要内容是：家庭中代际支持是基于什么原则发生，是社会交换论中的互惠原则还是合作社/互助理论中的利他主义的原则，还是二者并存？其二所关注的内容是：从父母与子女两个角度考察是什么因素对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和提供产生影响。

二、研究的目的

本文旨在对中国家庭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考察各因素对代际支持的影响,阐释其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力的大小,验证西方社会交换理论和合作社/互助理论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适用性。

三、研究的意义

(一) 现实意义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使得养老需求增多,社会养老问题凸显,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家庭养老即子女对老年人的照顾和支持,这目前仍然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途径。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家庭结构由传统的大家庭逐步向“4-2-1”家庭结构过渡,家庭结构小型化趋势凸显(国务院办公厅,2011)这使得家庭内提供养老支持的可用性资源减少,再加之社会变革带来的两代人之间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年轻一代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这些都会对传统的代际支持产生影响。在这一情况下对老年人及其子女的代际互动进行研究,探讨当前代际支持关系的状况并对影响代际支持的原因进行探讨,可以把握老年人的生活状况以及当代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状况,对我国老龄政策的制定以及应对老龄化的问题,促进和谐的家庭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意义

1. 从理论方面来看,本研究可以检验西方社会交换理论和合作社/互助理论在中国家庭代际关系中的适用性,这一探讨对于研究者们构建中国的代际支持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2. 面对现有研究中对家庭代际支持状况所得结论产生的不同分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且对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在未来的变迁方向的理解也能提供依据。

3. 本研究将为代际支持的问题提供大样本的经验证据,并探索代际支持关系发生变化的原因,从而避免对代际重心倾斜的问题的泛道德性的评论。虽然目前关于代际支持重心向子女倾斜的个案研究很多,但并不能证明代际支持重心倾斜在普遍意义上是否以及如何存在,毕竟,违背孝道规范的案例在任何年代都存在,如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的调查结果那样,违背社会伦理观念的父子闹分家,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的江村都不乏这种例子。²

总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出现重大变迁,当代家庭中的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状况是怎样的?什么因素影响了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

² 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

获得和给与？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产生了影响？西方代际支持的社会交换理论和合作社/互助理论在中国的家庭代际关系中具有怎样的适用性？笔者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五节 本文的框架结构

本文是一篇有关当代中国家庭代际支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论文首先对家庭中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和提供的总体状况做出描述，然后运用逻辑斯蒂克回归等统计方法，对影响被访家庭代际支持的因素进行阐释，明确各种不同因素对代际支持的影响力的大小，以验证西方社会交换理论和合作社/互助理论在中国家庭的适用性。最后，总结全文，并对本研究的局限性进行讨论。

本文共分为以下 5 章：第 1 章导论，主要是在提出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对学术界有关代际支持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同时，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目的、意义以及文章的结构；第 2 章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假设，主要是对核心概念进行定义，并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作出详细说明，说明研究的理论基础，并对研究假设做出陈述；第 3 章对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状况总体概述，描述被访家庭代际支持的总体概况；第 4 章探讨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影响因素；第 5 章结论。

第二章 研究方法 with 理论假设

本研究是基于定量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检验研究。在研究目的上,本文是一种解释性研究,主要的目的在于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章对核心概念进行辨析,对资料来源进行说明,从抽样方法、分析单位、资料分析的方法、基本变量及测量等四个方面详细阐明本文的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的理论和研究假设进行详细阐述。

第一节 概念界定及研究方法

一、核心概念界定

由第一章对国内国外对代际支持定义梳理可知,代际支持是代际关系狭义的范畴,它包括亲子关系和祖孙关系以及三代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国内国外对代际支持类别的划分或者说说法不太一致,但总的看来代际支持主要涉及经济,生活照料(工具性支持)和情感慰藉三个方面的代际互动。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父母与子女之日常生活照料支持(工具性支持)的互动,它是指: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同时也包括老年人为子女提供的家务、照料未成年子女等日常生活帮助。

二、资料来源

本文所用资料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2011 年度中国老年人状况追踪调查所得的数据资料。

三、分析单位

分析单位是一项社会研究中被分析和描述的对象(人或事物),主要有个人、群体、组织、社区、社会产品五种类型(风笑天,2009)。本文的分析单位是个人,即家庭中的子代和亲代。通过对个人进行描述,并将这些描述进行聚合处理,我们才能够描述和解释由个人所组成的各种群体,以及由个人的行为和态度所构成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想象(风笑天,2009)。本研究以父母和子女每个个人资料为分析单位。

四、资料分析方法

在资料分析方法方面,代际支持的分析方法既有定性资料的定性分析方法(贺雪峰,2009;陈柏峰 2008),也有定量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方法

主要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边馥琴, 约翰·罗根, 2001;; 范成杰, 2013), Logistic 回归分析(陈皆明, 1998; 刘爱玉, 杨善华; 2000; 杨菊华, 李路路, 2006; 徐勤, 2011); 因子分析(胡仕勇, 刘俊杰, 2013)。在本研究中, 资料的分析方法是定量的统计分析。本文第3章是对单个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特征描述以及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分析。但是社会现象间的联系很少只是单纯的一对一的关系, 一种社会现象的发生, 往往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因此需要考虑多种原因对其进行解释。第4章采用多个变量的分析, 主要使用多因分析的方法, 通过多因分析, 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 探求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力的大小。

第二节 理论假设

一、社会交换论

社会交换论自70年代开始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服务研究领域, 阐释有关权力关系、互惠、平衡等因素, 分析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惠关系、代际间的照顾和利益回报、家庭等非正规组织与正规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等, 其中解释老人的照顾与赡养是一个突出的主题(Dowd, 1975; Wenger, 1987; Specht, 1986; Stevens, 1992)。社会交换理论应用于代际支持的研究中, 他蕴含着: 成年人愿意为其父母提供支持是为了回报父母早期为他们提供的帮助(这是狭义的交流), 或者他们也会给其他的家庭成员如祖父母提供帮助(这是广义的交流)。社会交换论以互惠原则为基础(Mauss 1925; Simmel, 1907, 1922)。

根据社会交换论的观点, 成年孩子对父母的支持取决于他们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从父母那里接受的各种资源(Blau 1964; Emerson 1976; Gouldner 1960; Stoller 1985)。成年孩子对父母的代际支持可以被两代间长期和短期的交换解释。

第一种类型是长期连续的交换, 成年孩子将给父母提供帮助看做对父母早期培育和教育的投资的一种回报。当成年孩子支持年老父母是为了接受未来土地的继承或家庭财产时, 长期交换也会发生。东亚的研究发现从父母那里接受了大量投入(以教育, 财政转移或帮助就业的形式)的孩子, 更有可能支持他们年老时的父母(Lee and Xiao 1998; Lee et al. 1994; Silverstein et al. 2002)。由此得出假设:

假设 1: 经济资源越多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第二种代际交换类型表现为短期互惠。这种情境下, 儿子和女儿提供财产资源给父母作为对他们帮忙做家务劳动和照料孩子的交换(Morgan and Hiroshima

1983)。中国的研究显示相当一部分(30%-65%)的老年人帮助他们的孩子做家务劳动和照看孩子(He et al. 1986)。Lee and Xiao 发现老年中国父母,尤其是那些城市地区的,提供家务活或其他服务作为从成年孩子那里获得财政支持的交换(Lee and Xiao, 1998)。由此可以推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给子女提供家务支持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假设 3: 给子女照看小孩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二、合作社/互助理论

合作社/互助理论融入了家庭成员的情感因素,强调利他主义的原则,贝克指出,利他主义的动机,也就是说,在父母“需要”的时候,子女的资源会流向父母,反之亦然。这里,“需要”被定义为由于健康和经济状况不好而产生的需要(转引自徐勤,2011)家庭被视为一个照顾所有家庭成员福利、寻求家庭资源最有配置的紧密联系的网络(Lee Parish et al.,1994)。家庭中最需要(通常指经济、社会和健康方面的需求)帮助的人会得到支持(Altonji, Hayashi et al., 1992)。

这种理论模型表明,从父母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否从孩子那里接受某种类型的支持取决于他们的具体需求,如他们的经济和健康状况以及从家庭网络中可以利用的资源,如孩子数量(Sun, 2002)。有研究发现孩子的数量与老年人获得的支持和一般的福祉是积极相关的(Hermalin, Ofstedal and Chang 1996; Pei and Pillai 1999)。当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每一个孩子都被期望提供支持,有较多孩子意味着有一个较大的潜在支持资源。

这样的互助行为也反映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的地理距离和他们提供帮助的形式之间的关系。有些形式的支持需要距离上的十分接近,其他的支持在相距很远的时候也能执行。例如,经济支持较少依赖距离,然而个人照料和日常活动的帮助需要地理上的接近。因此,孩子们提供某些类型的支持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视他们与他们父母地理上的接近程度而定。

在提供支持中孩子的性别角色也与互助模式相符合。在中国文化中,儿子是家姓的传承和家庭财产的合法继承人。相比之下,女儿被描绘成泼出去的水。因此,父母和儿子之间应该有密切的联系,并且儿子是预期的对父母晚年生活负主要责任的人。然而,最近的研究发现,女儿比儿子更加容易给父母提供护理。此外,研究发现儿子更容易提供货币支持,女儿更普遍的参与日常活动的帮助(Wang, 1999)。因此基于文化期望对兄弟姐妹不同性别与代际支持的不同分工有一个预测。

根据上面的论述,发展出了四个假设:

假设 4: 需求较大的老年人(年龄较大的,没有配偶的,收入较低的,健康

状况较差)更有可能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假设 5: 孩子数量越多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或得较多的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假设 6: 与父母住的近的孩子更有可能给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假设 7: 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为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第三节 基本变量和测量

一、因变量

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根据已有的研究(杨菊华, 李路路 2009, 王萍, 高蓓 2011)通过询问“过去一年他(她)在家务方面给您的帮助”, “几乎天天帮助”, “每周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一年几次”, “几乎没做过”, 我们根据研究目的, 将因变量的取值做处理, 将其重新编码为一个取值为 0, 1 的二分类变量, 将“几乎天天帮助”, “每周至少一次”, “每月至少一次”, “一年几次”都视为为老年人接收的帮助, 编码为 1, 将“几乎没做过”编码为 0。

二、自变量

(一) 老年人的需求

老年人的需求由他们的年龄, 婚姻状况, 身体状况来测量。父母的年龄作为连续变量直接进入。因为大多数单身老年人都是丧偶的, 他们的婚姻状况划分为目前有配偶和没有配偶两类。身体状况通过老年人健康自评, 划分为健康和 unhealthy 两类。

(二) 老年人的社会经济资源

通过收入来测量, 收入是个连续变量直接进入。

(三) 父母提供支持方面

通过询问过去一年您在家务方面给他(她)的帮助: 划分为有和无两类。还通过询问: 您现在是否替他照看孩子: 是, 否。

(四) 孩子的社会经济资源

职业能够代表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按照曾经主要从事的职业将老年人分为两类: 一类从事农业、养殖业、渔业, 代表着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 一类属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宋璐, 李树茁, 2006)。本文也将子女职业按照这一标准划分。

(五) 孩子的数量

划分为 2, 3, 4, 5 个及以上, 独生子女老人作为参考类别。

(六) 居住情况

划分为 5 类: 同住, 同一居/村委会, 本县市, 本省, 省外

三、缺失值

在数据分析过程中, 缺失值直接剔除。

第三章 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描述性分析

本章首先对进入模型的各变量进行单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然后将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与老年人社会人口统计变量,与老年人提供支持的变量(是否提供孙子女照料以及与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以及与子女特征(性别,子女的工作情况)家庭特征(子女数量,居住距离)自变量作交互分析,描述性分析的目的在于考察各变量的数据分布情况,以及各自变量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相关关系。

第一节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的核心变量是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从父母角度考虑的自变量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健康自评状况)和父母给与支持的自变量(为子女照看孩子的情况和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从子女角度考虑的自变量(子女性别,子女的工作情况),另外进入模型的还有家庭特征的变量(子女数量和居住距离)对这些变量分别进行单变量的描述性分析,可以了解其数据分布状况,为相关关系的考察和回归分析作准备。

一、自变量的描述

表 3.1 显示了老年人性别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896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女性有 1773 人,占样本 45.5%;男性有 2123 人,占样本的 54.50%。

表 3.1 老年人性别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女	1773	45.5
男	2123	54.5
合计	3896	100.0

表 3.2 显示了老年人的年龄情况。有效样本为 3843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年龄最小的为 60 岁,年龄最大的为 91 岁,平均年龄是 71.79 岁。

表 3.2 老年人年龄情况 单位：岁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年龄	3843	60	91	71.79

表 3.3 显示了老年人婚姻状况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914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没有配偶的 1239 人，占样本 31.7%；有配偶的老人有 2675 人，占样本的 68.3%。

表 3.3 老年人婚姻状况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没有配偶	1239	31.7
有配偶	2675	68.3
合计	3914	100.0

表 3.4 显示了老年人健康状况自评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924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大部分的老人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自评都认为是健康。认为自己身体健康的老人有 2514 人，占样本的 64.1%；认为自己身体不健康的有 1410 人，占样本 35.9%。

表 3.4 老年人健康状况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不健康	1410	35.9
健康	2514	64.1
合计	3924	100.0

表 3.5 显示了老年人的收入情况。有效样本为 3540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老年人去年一年的收入，最少的是 0 没有收入，最多的是 128400 元，平均收入是 7722.94 元。

表 3.5 老年人去年一年的收入情况 单位：元

	N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 少?	3540	0	128400	7722.94

表 3.6 显示了老年人是否帮助子女照料孩子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883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没有帮助照看孙子女的老人有 3347 人，占样本 86.2%；帮助照看孙子女的老人有 536，占样本的 13.8%。

表 3.6 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没有帮助照看孙子女	3347	86.2
帮助照看孙子女	536	13.8
合计	3883	100.0

表 3.7 显示了老年人是否给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879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没有给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人有 2939 人，占样本 75.8%；给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人有 940 人，占样本的 24.2%。

表 3.7 老年人给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没有帮助过	2939	75.8
提供过帮助	940	24.2
合计	3879	100.0

表 3.8 显示了老年人子女性别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930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女性有 1885 人，占样本 48.0%，男性有 2045 人，占样本的 52.0%。

表 3.8 老年人子女性别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女	1885	48.0
男	2045	52.0
合计	3930	100.0

表 3.9 显示了老年人子女职业分布的情况。有效样本为 3838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从事农业的有 1679 人，占样本 43.7%；从事非农业的有 2159 人，占样本的 56.3%。

表 3.9 老年人子女职业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农业	1679	43.7
非农	2159	56.3
合计	3838	100.0

表 3.10 显示了子女教育水平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910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有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有 1426 人，占样本 36.5%，初中文化水平的有 1466 人，占样本的 37.5%，高中文化水平的有 667 人，占样本的 17.1%，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 351 人，占样本的 9.0%。

表 3.10 老年人子女教育水平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小学及以下	1426	36.5	36.5
初中	1466	37.5	74.0
高中及中专	667	17.1	91.0
大专及以上学历	351	9.0	100.0
合计	3910	100.0	

表 3.11 显示了老年人拥有子女数量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894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有 1 个子女的老人有 75 人，占样本 1.9%，有 2 个子女的老人有 404 人，占样本的 10.4%，有 3 个子女的老人有 875 人，占样本的 22.5%，有 4 个子女的老人有 1041 人，占样本的 26.7%；有 5 个及以上子女的老人有 1499 人，占样本的 38.5%。

表 3.11 老年人拥有子女数量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独生子女	75	1.9	1.9
两个子女	404	10.4	12.3
三个子女	875	22.5	34.8
四个子女	1041	26.7	61.5
五个及以上	1499	38.5	100.0
合计	3894	100.0	

表 3.12 显示了老年人与子女居住距离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901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与父母同住的子女有 297 人，占样本 7.6%；与父母住同一个村/居的子女有 915 人，占样本的 23.5%；与父母住同一个县市的子女有 1200 人，占样本的 30.8%；与父母住在同一个省份的子女有 863 人，占样本的 22.1%；与父母不住同一个省份，省外的子女有 626 人，占样本的 16.0%。

表 3.12 老年人与子女的居住距离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百分比
同住	297	7.6
本村/居委会	915	23.5
本市县	1200	30.8
本省	863	22.1
省外	626	16.0
合计	3901	100.0

二、因变量的描述

表 3.13 显示了子女给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分布情况。有效样本为 3886 个。从表中可以看出，没有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年人有 1744 人，占样本的 44.9%，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年人有 2142 人，占样本的 55.1%。

表 3.13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分布情况 单位：人、%

	频率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没有获得支持	1744	44.9	44.9
获得支持	2142	55.1	100.0
合计	3886	100.0	

第二节 相关关系的描述

本研究从父母角度考虑的自变量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性别, 年龄, 收入,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父母给与支持的自变量(为子女照看孩子的情况和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状况); 从子女角度考虑的自变量(子女性别, 子女的工作情况), 另外还有家庭特征的自变量(子女数量和居住距离), 将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作为因变量。本节将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做交互分析, 考察变量之间是否相关, 只有确定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相关的, 才有可能进一步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被访者个体特征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关系

表 3. 14 反映了老年人的性别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 14 可以看出: 被访者的性别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不相关的, τ -y 系数为 0, 也就是说, 老年人的性别与他们是否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无关的, 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认为老年人的性别会与获得的支持相关(宋璐, 李树茁, 2011) 所得结论不相符。

表 3. 14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性别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老年人性别		合计
	男	女	
没有获得支持	45. 2	44. 1	44. 7
获得支持	54. 8	55. 9	55. 3
合计	100. 0 (2105)	100. 0 (1751)	100. 0 (3856)

τ -y= 0.000 $\chi^2=0.459$

表 3. 15 反映了老年人的年龄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关系。通过表 3. 15 可以看出: 年龄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相关的, 但系数不大, 相关系数只有 0. 049。这说明被访者的年龄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年龄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相关关系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 002, 小于 0. 01 的显著度。由于 Pearson 系数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 由此这也说明如果仅以被访者的年龄来预测被访者日常生活支持的获得, 可以减少 4. 9% 的误差。

表 3.15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年龄的相关分析 单位：岁

		年龄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Pearson 相关性	.049**
	显著性	.002
	N	3811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表 3.16 反映了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16 可以看出：被访者的婚姻状况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不相关的， τ -y 系数为 0。也即，老年人的婚姻状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无关的，这与有些研究中认为婚姻状况与代际支持有密切关系，丧偶会使得老人的照顾需求增加（杜鹃、武超，1998；Hermalin, Ofstedal et al., 1996）的观点相反。

表 3.16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婚姻状况交互情况 单位：%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老年人婚姻状况		合计
	有配偶	无配偶	
没有获得支持	45.3	43.8	44.8
获得支持	54.7	56.2	55.2
	100.0	100.0	100.0
合计	(2653)	(1216)	(3869)

τ -y= 0.000 $\chi^2=0.733$

表 3.17 反映了老年人的健康自评状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17 可以看出：被访者的健康状况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也是不相关的， τ -y 系数为 0。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与其是否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是无关的。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会影响其照料支持的获得（shi, 1993；熊跃根，1998）结论不一致。

表 3.17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健康状况交互情况 单位：%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老年人健康状况		合计
	健康	不健康	
没有获得支持	44.2	46.3	45.0
获得支持	55.8	53.7	55.0
	100.0	100.0	100.0
合计	(2481)	(1398)	(3879)

tau-y= 0.000 $\chi^2=1.540$

表 3.18 反映了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18 可以看出：被访者的收入状况与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是相关的，Pearson 相关系数是 0.064。这说明被访者的收入状况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有较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的收入状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关系显著。显著性水平为 0.000，小于 0.01 的显著度。由于 Pearson 系数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这说明如果仅以被访者的收入状况来预测被访者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可以减少 6.4% 的误差。

表 3.18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老年人收入的相关分析 单位：元

您个人去年全年的总收入是多少？		
	Pearson 相关性	.064**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显著性（双侧）	.000
	N	3501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二、被访者给与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表 3.19 反映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情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19 可以看出：被访者照料孙子女的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不相关的，tau-y 系数是 0，这说明被访者是否为子女照料孩子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不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社会交换论的假设 2。

表 3.19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照料孙子女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照料孙子女		合计
	没有照料	照料	
没有获得支持	46.0	37.9	44.9
获得支持	54.0	62.1	55.1
	100.0	100.0	100.0
合计	(3337)	(536)	(3873)
$\text{tau-y} = 0.000 \quad \chi^2 = 12.328$			

表 3.20 反映了老年人子女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0 可以看出: 被访者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的支持是相关的, 但系数不大, tau-y 系数只有 0.081。这说明被访者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相关关系显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 χ^2 值为 267.991, 显著性水平为 0.000, 小于 0.001 的显著度。由于 tau-y 系数具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 因此,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他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情况的 $\text{tau-y} = 0.081$ 也意味着如果仅以被访者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情况来预测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可以减少 8.1% 的误差。

表 3.20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给与孩子提供家务帮助		合计
	没有帮助过	提供过帮助	
没有获得支持	52.4	21.9	45.0
获得支持	47.6	78.1	55.0
	100.0	100.0	100.0
合计	(2935)	(938)	(3873)
$\text{tau-y} = 0.081 \quad \chi^2 = 267.991 (P = 0.000)$			

三、子女的个体特征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分析

表 3.21 反映了老年人的子女性别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1 可以看出: 被访者子女的性别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是相关的, 但系数很小, tau-y 系数只有 0.001。这说明被访者子女的性别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子女性别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相关关系显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 χ^2 值为 8.134, 显著性水平为 0.004, 小于 0.05 的显著度。由于 tau-y 系数具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 因此,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性别的 tau-y=0.001 也意味着如果仅以子女的性别来预测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可以减少 0.1% 的误差。

表 3.21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性别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子女性别		合计
	男	女	
没有获得支持	47.1	42.5	44.9
获得支持	52.9	57.5	55.1
合计	100.0 (2019)	100.0 (1866)	100.0 (3885)
tau-y= 0.001 $\chi^2=8.134(P=0.004)$			

表 3.22 反映了老年人子女的工作情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2 可以看出: 被访者子女的工作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不相关的, tau-y 系数为 0。这说明被访者子女的工作情况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不相关。

表 3.22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工作情况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子女工作		合计
	农业	非农业	
没有获得支持	39.3	48.9	44.7
获得支持	60.7	51.1	55.3
合计	100.0 (1668)	100.0 (2142)	100.0 (3810)
tau-y= 0.000 $\chi^2=35.384 (P=0.000)$			

表 3.23 反映了老年人子女的教育水平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3 可以看出: 被访者子女的教育水平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系数 d_y 为 0.002, 且不显著这说明被访者子女的教育水平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不相关。

表 3.23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的教育水平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子女教育水平				合计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及中专	大专及以上	
没有获得支持	47.0	44.8	42.6	40.3	44.8
获得支持	53.0	55.2	57.4	59.7	55.2
合计	100.0 (1412)	100.0 (1454)	100.0 (665)	100.0 (347)	100.0 (3878)

$d_y = 0.002 \quad \chi^2 = 6.788 (P = 0.079)$

四、家庭特征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关系分析

表 3.24 反映了老年人的子女数量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4 可以看出: 被访者子女的数量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是相关的, 但系数不大, d_y 系数只有 0.004。这说明被访者子女的数量与其获得的支持之间只有微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子女数量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相关关系显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 χ^2 值为 16.666, 显著性水平为 0.002, 小于 0.05 的显著度。由于 d_y 系数具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 因此,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数量的 $d_y = 0.004$ 也意味着如果仅以子女的数量来预测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情况可以减少 0.4% 的误差。

表 3.24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数量的交互情况 单位: %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子女数量					合计
	独生子女老 人	两个子女	三个子女	四个子女	5 个及以上	
没有获得支持	54.2%	40.6%	48.6%	41.2%	46.0%	44.8%
获得支持	45.8%	59.4%	51.4%	58.8%	54.0%	55.2%
合计	100.0 (72)	100.0 (404)	100.0 (863)	100.0 (1037)	100.0 (1475)	100.0 3851

$d_y = 0.004 \quad \chi^2 = 16.666 (P = 0.002)$

表 3.25 反映了老年人与子女居住情况与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交互情况。通过表 3.25 可以看出：被访者与子女居住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是相关的， d_y 系数只有 0.087。这说明被访者与子女居住情况与其获得支持之间有较弱的相关关系。被访者与子女居住情况与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相关关系显著。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 χ^2 值为 338.276，显著性水平为 0.000，小于 0.05 的显著度。由于 d_y 系数具有消减误差比例的意义，因此，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和其与子女居住情况的 d_y 系数是 0.087，意味着如果仅以被访者与子女居住情况来预测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可以减少 8.7% 的误差。

表 3.25 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与子女居住情况的交互情况 单位：%

获得日常生活照料	居住距离					合计
	省外	本省	本县市	本乡镇	同住	
没有获得支持	75.0	51.3	41.2	38.3	20.1	44.8
获得支持	25.0	48.7	58.8	61.7	79.9	55.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合计	(624)	(316)	(1171)	(1472)	(289)	(3872)

$d_y = 0.087 \quad \chi^2 = 338.276 \quad (P = 0.000)$

本章首先描述了进入模型的几个变量的数据分布情况，然后将各自变量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做了交互分析，分别考察了父母角度的自变量包括社会人口统计变量（性别，年龄，收入，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父母给与支持的自变量（为子女照看孩子的情况和为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从子女角度考虑的自变量（子女性别，子女的工作情况）；以及家庭特征的变量（子女数量和居住距离）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

结果显示了老年人的年龄、收入、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以及子女性别、子女数量和居住距离均与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相关，而且这些相关关系是显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中，考察其是否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影响因素。虽然变量之间的相关已经部分揭示了代际间生活照料支持的影响因素，但是仅仅做相关显然是不够的。与相关关系的分析相比，回归分析在提供有关因果关系的说明、利用模型进行预测以及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优势。

在第四章，本研究将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作为因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各自变量的作用，检验假设的有效性。

第四章 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回归分析

对于代际支持的研究,目前学者也采取了多种统计方法。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分析方法是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第一节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一、Logistic 回归分析的适用条件

在社会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选择往往取决于变量的个数和研究者所拥有的数据资料的测量层次。逻辑斯谛克(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在 Logistic 回归模型中,研究假设的因变量不能被表述为自变量的线性函数,而是需要通过 logit 转换,将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转换为自变量对 logitp 的影响。自变量与 logitp 的关系是线性的,因此 Logistic 回归模型被表述为自变量与 logitp 的线性函数。

其基本的适用条件是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多个自变量与分类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通过建立逻辑斯谛克(logistic)回归模型,把因变量视为一个事件发生或不发生的极串,研究当自变量发生变动时,因变量概率的变动情况。

二、Logistic 回归分析的数学原理

在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条件下如何建立逻辑斯谛克(Logistic)回归模型?逻辑斯谛克(Logistic)回归模型的数学原理为:假设因变量发生的概率为 P,可以用 Logistic 概率函数表示为

$$p(y=1/x) = \frac{\exp(\sum b_i x_i)}{1 + \exp(\sum b_i x_i)} \quad \text{公式(4.1)}$$

这里, X_i 为研究的自变量, b_i 为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exp(u)$ 表示自然对数底的指数函数。我们再用事件发生的概率 P 除以事件不发生的概率 $(1 - P)$, 就得到因变量事件发生的概率比(the odds of experiencing an event, 简称为 odds, 计为 Ω), 如公式(4.2)

$$\text{所示: } \Omega = \frac{p}{1-p} \quad \text{公式(4.2)}$$

将(1)式代入(2)式并对两边取对数,经数学转换,得到公式(4.3):

$$\ln \Omega = \sum b_i x_i \quad \text{公式(4.3)}$$

这种将 P 转换为 $\ln \Omega$ 的过程称为“logit 转换”（郭志刚，1999：177—194）。通过这样的转换，达到了将因变量发生的概率函数用自变量来线性表达的目的。在具体解释回归系数的作用时，我们可以通过对每个自变量的发生比率（odds ratio，数学表达式为 $\text{Exp}(B_i)$ 的考察），来确定自变量每一个单位的变化给原来发生比带来的变化。

本研究的因变量代际间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获得是一个二分变量，其变量值只有两个，即“获得”与“未获得”两类。它与自变量的多元分析可以采用 SPSS 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备选自变量中筛选出解释或预测能力最强的一些自变量，可以使用 SPSS 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的自动筛选功能。

在此，本研究运用“输入法—条件参数估计原则”。这种有条件的向前回归方式可以使备选变量逐步进入模型进行分析，即在截距模型的基础之上，将符合所设定显著水平（默认的显著自变量自动进入模型时的 F 值对应的概率值为 0.05）的自变量一次一个地加入模型。也就是说，它由零模型开始，然后将符合标准的变量逐步加入模型。在每一步中，程序都会根据回归检验结果，自动检查是否已经加入的变量因为模型纳入其他变量而变得不显著了，并自动删除那些在加入其它自变量后又不符合显著性水平的自变量。如若变量的 Wald 统计量显著水平值超过了所设定的删除标准（默认的自变量自动被排除出模型时的 F 值对应的概率值为 0.10）则此变量就会被删除掉；而如若没有符合删除标准的变量，则程序还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通过这样的不断加入和删除，直至所有分析方案都经过试验，亦即一直到再没有一个可加入或可删除的变量出现为止，此时最终模型中剩下的只是那些检验结果显著的自变量。

第二节 统计分析结果

一、模型基本情况

我们采用正向逐步回归方式进行分析，在进行分析时，笔者已将相应的变量都处理为虚拟变量，设置分类自变量虚拟化为虚拟变量时均以其各自的第一水平作为对照。另外，年龄和收入变量是作为连续型变量直接进入模型的。缺失值直接在分析的时候剔除。

在 3931 个案中，除了 661 例含有缺失值外，有 3270 例被选中并列入分析（见表 4.1）

表 4.1 案例处理汇总：单位：人、%

未加权的案例 ^a	N	百分比
包括在分析中	3270	83.2
选定案例		
缺失案例	661	16.8
总计	3931	100.0

a. 如果权重有效，请参见分类表以获得案例总数。

在因变量的赋值上，外部编码与内部编码一致(见表 4.2)

表 4.2 因变量编码情况

初始值	内部值
没有获得支持	0
获得支持	1

除年龄、收入外，笔者将所有自变量作为分类变量处理，其编码由 SPSS 内部自动生成(见表 4.3)。由于内码为零对应的类型是模型定义的基准情况，从表 4.3 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变量虚拟化之后，虚拟变量都是以其各自的第一水平作为对照的。对各个变量而言，居住距离的参照组是“省外”，孩子数量的参照组是“独生子女”，子女教育水平的参照组是“小学及以下”，照料孙子女的参照组是“没有照料”，老年人婚姻状况的参照组是“有配偶”，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参照组是“健康”，子女性别的参照组是“男”，给予孩子提供家务帮助的参照组是“没有帮助过”，子女工作的参照组是“农业”，老年人性别的参照组是“男”。

表 4.3 分类变量编码

		频率	参数编码			
			(1)	(2)	(3)	(4)
居住距离	省外	516	.000	.000	.000	.000
	本省	273	1.000	.000	.000	.000
	本县市	1008	.000	1.000	.000	.000
	本乡镇	1239	.000	.000	1.000	.000
	同住	234	.000	.000	.000	1.000
	独生子女老人	59	.000	.000	.000	.000
拥有孩子数量	两个子女	354	1.000	.000	.000	.000
	三个子女	730	.000	1.000	.000	.000
	四个子女	873	.000	.000	1.000	.000
	五个及以上	1254	.000	.000	.000	1.000
	小学及以下	1169	.000	.000	.000	
子女教育水平	初中	1227	1.000	.000	.000	
	高中及中专	569	.000	1.000	.000	
	大专及以上	305	.000	.000	1.000	
	没有照料	2808	.000			
照料孙子女	照料	462	1.000			
	有配偶	2277	.000			
老年人婚姻状况	无配偶	993	1.000			
	健康	2099	.000			
老年人健康状况	不健康	1171	1.000			
	男	1700	.000			
子女性别	女	1570	1.000			
	没有帮助过	2462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帮助	提供过帮助	808	1.000			
	农业	1376	.000			
子女工作	非农业	1894	1.000			
	男	1824	.000			
老年人性别	女	1446	1.000			

二、logistic 回归模型评价

我们需要评价模型如何有效地描述因变量以及模型匹配观测数据的程度,如果模型预测值和对应的观测值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则可认为此模型拟合数据;反之,我们将不能接受这一模型,而需要重新设置模型。

研究者们评价或检验含有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时,通常是将其与截距模型相比较(即将所有自变量删除后只剩下一个截距系数的模型: $\text{logit}=\alpha$)。以截

距模型作为标准,比较再加入其他自变量后新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水平是否有显著提高,或者说,这些变量是否如模型假设那样提供了对于因变量变化的解释(郭志刚,1999)。关于模型的适当性,我们可以通过下列指标来判:

(一) 拟合优度

因为我们在此采用的是正向逐步回归,即后面的模型是在前一步模型变量的基础上再加入或减少某些变量而形成的,因此,前后模型之间存在着嵌套关系。故而,我们可以通过偏差指标(-2LL)来分析两个有嵌套关系的模型之间的差别,进而判断特定变量的重要性(王济川、郭志刚,2001)。

通过表 4.4 我们可以发现,第二步的-2LL 值较第一步减少了 176.754,第三步较第二步减少了 24.352,第四步较第三步减少了 22.293,第五步较第四步减少了 24.092,第六步较第五步减少了 12.766。这说明,基本来看每一步对数据的拟合程度都较其前一步有所提高,模型拟合状况在逐步趋好。

表 4.4 模型汇总

步骤	-2 对数似然值
1	4224.897 ^a
2	4048.143 ^a
3	4023.791 ^a
4	4001.498 ^a
5	3977.406 ^a
6	3964.640 ^a

a. 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 .001,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 4 处终止。

(二)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预测准确性

对于模型预测准确性的评价,我们可以采用类 R^2 指标,类 R^2 指标可以认为是估计模型预测准确性的粗略近似。由表 4.5 可知,每一步骤的 Cox & Snell R^2 值较前一步都有所增加;同时,每一步骤的 Nagelkerke R^2 值较前一步也都有所增加。这表明,通过逐步回归,模型的预测准确性在逐渐增强。

表 4.5 模型汇总

步骤	Cox & Snell R 方	Nagelkerke R 方
1	.079	.105
2	.127	.170
3	.134	.179
4	.139	.187
5	.146	.195
6	.149	.200

a. 因为参数估计的更改范围小于 .001, 所以估计在迭代次数 4 处终止。

另外, 我们还可以直接考察 SPSS 输出的“预测分类表”, 通过它来看模型预测准确性的具体情况。由表 4.6 可知: 在步骤 0 中, 模型中仅有常数项, 此时的模型预测总正确率为 55.6%, 在步骤 1 中提高到 63.2%; 在步骤 2 中提高到 64.2%; 步骤 3 中提高到 64.5%; 步骤 4 中提高到 66.3%; 步骤 5 中提高到 66.4%; 步骤 6 中达到 67.6%。这就更直观地说明, 在逐步回归的过程中, 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是逐步提升的。

表 4.6 预测分类表^a

已观测			已预测		百分比校正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获得支持	
步骤 0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0	1453	.0
		获得支持	0	1817	100.0
	总计百分比				55.6
步骤 1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519	934	35.7
		获得支持	270	1547	85.1
	总计百分比				63.2
步骤 2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511	942	35.2
		获得支持	229	1588	87.4
	总计百分比				64.2
步骤 3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667	786	45.9
		获得支持	375	1442	79.4
	总计百分比				64.5
步骤 4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716	737	49.3
		获得支持	365	1452	79.9
	总计百分比				66.3
步骤 5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752	701	51.8
		获得支持	399	1418	78.0
	总计百分比				66.4
步骤 6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777	676	53.5
		获得支持	385	1432	78.8
	总计百分比				67.6

a. 切割值为 .500

(三) 模型 χ^2 统计

要让对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解释有意义,就需要模型中所包含的自变量必须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解释能力,亦即说所设模型必须要比零假设模型(即只包含常数项的模型)要好。此时,欲检验的零假设即“除常数项外的所有系数都等于零”,logistic 回归中使用的是似然比检验方法,其似然比统计量近似地服从于 χ^2 分布,可以用它来检验 logistic 归模型是否统计性显著(王济川,郭志刚,2001)。

模型 χ^2 被定义为零假设模型与所设模型之间在-2LL 的差距,它是关于自变量是否与所研究事件的对数发生比(log odds)线性相关的检验。从表 4.7 可知,六个步骤中,模型 χ^2 值由步骤 1 的 267.683 增加到步骤 2 的 444.437,到步骤 3 的 468.789,第 4 步的 491.082,第 5 步的 515.174 到最后达到 527.940,且每一步骤的模型 χ^2 值检验都显示其统计性显著($p < 0.001$)。这说明,每一步骤中纳入的变量对于模型拟合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也表明,逐步回归中每一个步骤的模型也都是统计性显著的。

表 4.7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

		卡方	df	Sig.
	步骤	267.683	4	.000
步骤 1	块	267.683	4	.000
	模型	267.683	4	.000
	步骤	176.754	1	.000
步骤 2	块	444.437	5	.000
	模型	444.437	5	.000
	步骤	24.353	1	.000
步骤 3	块	468.789	6	.000
	模型	468.789	6	.000
	步骤	22.293	1	.000
步骤 4	块	491.082	7	.000
	模型	491.082	7	.000
	步骤	24.091	4	.000
步骤 5	块	515.174	11	.000
	模型	515.174	11	.000
	步骤	12.767	1	.000
步骤 6	块	527.940	12	.000
	模型	527.940	12	.000

三、logistic 正向逐步回归的过程及结果解释

现在，我们开始对模型进行拟合。SPSS 首先输出的模型不含任何自变量，而只有常数项。从此时的预测分类结果看，当模型中不包含任何自变量时，所有观测对象皆被预测为“获得支持”，其总的预测准确率为 55.6%(见表 4.8)。

表 4.8 分类表^{a,b}

已观测			已预测		百分比校正
			没有获得支持	获得支持	
步骤 0	获得支持	没有获得支持	0	1453	.0
		获得支持	0	1817	100.0
总计百分比					55.6

a. 模型中包括常量。

b. 切割值为 .500

这时模型里各参数的检验结果中，只有常数项，其系数为 0.224，尽管常数项有无统计学意义关系不大（张文彤，2002），此处还是显著性的（见表 4.9）。

表 4.9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0 常量	.224	.035	40.350	1	.000	1.251

表 4.10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得分	df	Sig.
老年人收入	15.130	1	.000
老年人年龄	10.883	1	.001
老年人性别	.666	1	.414
老年人婚姻状况	.003	1	.953
老年人健康状况	1.160	1	.281
孩子数量	19.004	4	.001
两个子女	3.408	1	.065
三个子女	11.791	1	.001
四个子女	4.931	1	.026
五个及以上	.054	1	.817
子女性别	11.252	1	.001
子女教育水平	3.746	3	.290
初中	.177	1	.674
高中中专	1.648	1	.199
大专及以上	1.329	1	.249
子女工作情况	24.487	1	.000
居住距离	260.365	4	.000
本省	4.511	1	.034
本县市	7.908	1	.005
本乡镇	31.644	1	.000
同住	54.314	1	.000
给子女提供生活照料支持	218.182	1	.000
给子女照看孩子的情况	7.054	1	.008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另外,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老年人的收入、年龄、给与子女家务支持的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的情况、子女的性别,子女的职业、子女的数量、居住距离,因为它们都有 $p < 0.05$,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而变量老年人的性别、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子女的教育程度则无统计意义(见

表 4.10)。因此,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其相应的标准乃是显著性水平。接下来,程序进行了有条件的正向逐步回归,其首先输出的是模型的全局检验,其执行的是似然比检验(见表 4.7)。从表 4.7 中可以看出:回归分析经历了六个步骤,上表给出了模型综合检验每一步的似然比检验结果。由于我们的分析中只定义了一个分组,故而在每一步骤中,模型的 χ^2 和分组才都是相同的。由相应的模型 χ^2 值检验结果可知(见表 4.7),在这六个步骤中,每一步的模型才值检验都达到了 0.001 的显著性水平;由分步 χ^2 值我们可以看出:第二步的分步 χ^2 贡献是 176.754,第三步的分步 χ^2 贡献是 24.353,第四步的分步 χ^2 贡献是 22.293,第五步的分步 χ^2 贡献是 24.091,第六步的分步 χ^2 贡献是 12.767,这说明每一步进入的变量都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和贡献。各步的预测分类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六步的总预测准确率从常数模型的 55.6%;提高到步骤 1 的 63.2%;在步骤 2 中提高到 64.2%;步骤 3 中提高到 64.5%;步骤 4 中提高到 66.3%;步骤 5 中提高到 66.4%;步骤 6 中达到 67.6%(见表 4.6)。

SPSS 的输出结果中有一张各步骤纳入方程中变量的总表,其中包括纳入模型的变量及常数项的系数值、标准误、Wald 统计量、自由度、显著性水平和发生比率值。下面,我们将其进行分解,来看各步中的情况:

第一步,在零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居住距离”这个变量,此时的常数项和居住距离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见表 4.11)。

表 4.11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居住距离			233.252	4	.000	
步骤 1 ^a						
本省	1.016	.157	41.778	1	.000	2.761
本县市	1.411	.119	140.768	1	.000	4.099
本乡镇	1.520	.116	171.667	1	.000	4.570
同住	2.340	.188	154.444	1	.000	10.386
常量	-1.038	.100	107.302	1	.000	.354

a. 在步骤 1 中输入的变量:居住距离。

当居住距离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程序会自动检查居住距离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居住距离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12),居住距离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这说明居住距离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因为未达到删除标准,这说明居住距离作用显著,所以予以保留,因而程序还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郭志刚, 1999)。

表 4.12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 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步骤 1 居住距离	-2246.396	267.895	4	.000

a. 基于条件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与孩子提供家务支持、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子女数量、子女性别、给与孩子提供家务支持、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因为它们都有 $p < 0.05$ ，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而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的作用则无统计意义(见表 4.13)。因此，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其相应的标准仍是显著性水平。

表 4.13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得分	df	Sig.
步骤 1	变量			
	老年人收入	8.158	1	.004
	老年人年龄	5.682	1	.017
	老年人性别	.004	1	.949
	老年人婚姻状况	1.074	1	.300
	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	.346	1	.557
	子女数量	20.272	4	.000
	两个子女	2.286	1	.131
	三个子女	9.703	1	.002
	四个子女	7.058	1	.008
	五个及以上	.009	1	.925
	子女性别	14.332	1	.000
	子女教育程度	3.152	3	.369
	初中	.063	1	.802
	高中中专	.690	1	.406
	大专及以上	1.686	1	.194
	子女工作情况	1.460	1	.227
	给与孩子提供家务支持	169.365	1	.000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5.437	1	.020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第二步，在含有常数项和年龄变量的模型基础上，程序进一步纳入了“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这个变量。此时，常数项和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 (见表 4.14)。

表 4.14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2 ^b 居住距离			190.459	4	.000	
本省	1.063	.162	43.231	1	.000	2.895
本县市	1.465	.123	142.808	1	.000	4.327
本乡镇	1.500	.119	157.702	1	.000	4.482
同住	1.850	.197	88.524	1	.000	6.359
给与子女提供家 务支持	1.255	.100	158.587	1	.000	3.507
常量	-1.296	.106	150.602	1	.000	.273

b. 在步骤 2 中输入的变量: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当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程序会自动检查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居住距离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15),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和居住距离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这说明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和居住距离变量在此时均未达到删除标准,这说明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居住距离变量作用显著,所以予以保留,因而程序还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

表 4.15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步骤 2 居住距离	-2131.734	215.325	4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 务支持	-2113.389	178.636	1	.000

a. 基于条件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子女数量、子女性别、因为它们都有 $p < 0.05$,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而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的作用则无统计意义(见表 4.16)。因此,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

表 4.16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得分	df	Sig.
步骤 2	变量	老年人收入	9.558	1	.002
		老年人年龄	22.184	1	.000
		老年人性别	.181	1	.671
		老年人婚姻状况	.514	1	.473
		老年人健康状况	.045	1	.831
		子女数量	26.040	4	.000
		两个子女	.213	1	.645
		三个子女	13.540	1	.000
		四个子女	6.147	1	.013
		五个及以上	1.944	1	.163
		子女性别	24.292	1	.000
		子女教育程度	1.909	3	.592
		初中	.103	1	.748
		高中中专	.927	1	.336
		大专及以上	.563	1	.453
		子女工作情况	3.690	1	.055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690	1	.406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第三步，在含有常数项、居住距离和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程序进一步纳入了“子女性别”这个变量。此时，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和子女性别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 (见表 4.17)

表 4.17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3 子女性别	.382	.078	24.197	1	.000	1.466
居住距离			187.061	4	.000	
本省	1.029	.162	40.230	1	.000	2.800
本县市	1.401	.123	129.153	1	.000	4.059
本乡镇	1.482	.120	153.381	1	.000	4.400
同住	1.936	.198	95.480	1	.000	6.931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1.300	.101	166.804	1	.000	3.670
常量	-1.465	.112	171.882	1	.000	.231

c. 在步骤 3 中输入的变量: 子女性别.

当子女性别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 程序会自动检查子女性别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居住距离和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18), 居住距离和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 这说明子女性别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居住距离和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在此时均未达到删除标准, 因而程序还可能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

表 4.18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步骤 3 子女性别	-2024.081	24.372	1	.000
居住距离	-2117.234	210.678	4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2106.323	188.856	1	.000

a 基于有条件的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 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 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 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 老年人收入、老年人年龄、子女数量, 因为它们都有 $p < 0.05$, 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 而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的作用则无统计意义(见表 4.19)。因此, 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

表 4.19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得分	df	Sig.
步骤 3	变量	老年人收入	9.519	1	.002
		老年人年龄	22.159	1	.000
		老年人性别	.098	1	.754
		老年人婚姻状况	.455	1	.500
		老年人健康状况	.031	1	.860
		子女数量	25.655	4	.000
		两个子女	.501	1	.479
		三个子女	13.231	1	.000
		四个子女	6.498	1	.011
		五个及以上	1.271	1	.260
		子女教育程度	4.405	3	.221
		初中	.019	1	.890
		高中中专	1.466	1	.226
		大专及以上	1.126	1	.289
		子女工作情况	.434	1	.510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123	1	.726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第四步，在含有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和子女性别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程序进一步纳入了“老年人年龄”这个变量。此时，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和老年人年龄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 (见表 4.20)

表 4.20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老年人年龄	.029	.006	22.024	1	.000	1.030
子女性别	.383	.078	24.175	1	.000	1.467
居住距离			175.823	4	.000	
本省	1.032	.163	39.980	1	.000	2.807
本县市	1.372	.124	122.981	1	.000	3.942
本乡镇	1.434	.120	142.301	1	.000	4.195
同住	1.910	.199	92.341	1	.000	6.754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1.379	.102	181.045	1	.000	3.970
常量	-3.547	.459	59.603	1	.000	.029

d. 在步骤 4 中输入的变量：老年人年龄。

当老年人年龄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程序会自动检查老年人年龄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和老年人年龄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21)，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和老年人年龄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这说明老年人年龄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和老年人年龄变量在此时均未达到删除标准，因而程序还可能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

表 4.21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步骤 4 老年人年龄	-2011.903	22.309	1	.000
子女性别	-2012.924	24.351	1	.000
居住距离	-2099.342	197.185	4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2103.710	205.922	1	.000

a. 基于条件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数量、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子女数量、因为它们都有 $p < 0.05$ ，

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而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的作用则无统计意义(见表 4.22)。因此,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

表 4.22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得分	df	Sig.	
步骤 4	变量	老年人收入	11.096	1	.001
		老年人性别	.129	1	.720
		老年人婚姻状况	4.567	1	.033
		老年人健康状况	.024	1	.878
		子女数量	24.296	4	.000
		两个子女	2.335	1	.126
		三个子女	7.853	1	.005
		四个子女	9.211	1	.002
		五个及以上	.364	1	.546
		子女教育程度	6.050	3	.109
		初中	.163	1	.687
		高中中专	1.254	1	.263
		大专及以上	1.871	1	.171
		子女工作情况	.056	1	.813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138	1	.710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第五步,在含有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和老年人年龄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程序进一步纳入了“子女数量”这个变量。此时,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和子女数量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 (见表 4.23)

表 4.23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步骤 5 ^e 老年人年龄	.031	.007	20.676	1	.000	1.031
子女数量			23.869	4	.000	
两个子女	1.095	.327	11.222	1	.001	2.988
三个子女	.732	.315	5.408	1	.020	2.080
四个子女	1.118	.314	12.675	1	.000	3.058
五个及以上	.897	.312	8.246	1	.004	2.451
子女性别	.391	.078	24.835	1	.000	1.478
居住距离			176.512	4	.000	
本省	1.044	.164	40.573	1	.000	2.842
本县市	1.374	.124	122.316	1	.000	3.952
本乡镇	1.434	.121	140.627	1	.000	4.194
同住	1.969	.202	95.475	1	.000	7.166
给与子女提供家 务支持	1.398	.104	182.188	1	.000	4.048
常量	-4.585	.586	61.304	1	.000	.010

e. 在步骤 5 中输入的变量: 子女数量.

当子女数量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程序会自动检查老年人子女数量这个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和子女数量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24),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和子女数量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这说明子女数量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老年人年龄变量和子女数量在此时均未达到删除标准,因而程序还可能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

表 4.24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 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步骤 5 老年人年龄	-1999.175	20.943	1	.000
子女数量	-2000.770	24.134	4	.000
子女性别	-2001.217	25.028	1	.000
居住距离	-2087.874	198.342	4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 务支持	-2092.754	208.102	1	.000

a. 基于条件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则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有：老年人收入、因为它有 $p < 0.05$ ，所以能使模型改变具有统计意义，而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的作用则无统计意义(见表 4.25)。因此，下一步的变量筛选应当考虑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中间选取。

表 4.25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步骤 5	变量	得分	df	Sig.
	老年人收入	12.433	1	.000
	老年人性别	.365	1	.546
	老年人婚姻状况	4.987	1	.026
	老年人健康状况	.004	1	.949
	子女教育程度	6.203	3	.102
	初中	.139	1	.710
	高中中专	1.364	1	.243
	大专及以上	1.782	1	.182
	子女工作情况	.091	1	.762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561	1	.454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第六步,在含有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和子女数量变量模型的基础上,程序进一步纳入了“老年人收入”这个变量。此时,常数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子女数量和老年人收入变量同时具有统计显著性($p < 0.01$) (见表 4.26)

表 4.26 纳入方程中的变量

	B	S.E.	Wals	df	Sig.	Exp (B)
老年人收入	.000	.000	12.331	1	.000	1.000
老年人年龄	.030	.007	20.038	1	.000	1.031
子女数量			25.245	4	.000	
两个子女	1.064	.329	10.488	1	.001	2.898
三个子女	.729	.317	5.305	1	.021	2.073
四个子女	1.153	.316	13.325	1	.000	3.168
五个及以上	.954	.314	9.212	1	.002	2.597
子女性别	.388	.079	24.335	1	.000	1.474
居住距离			169.335	4	.000	
本省	1.013	.164	37.943	1	.000	2.753
本县市	1.312	.126	109.191	1	.000	3.713
本乡镇	1.428	.121	138.943	1	.000	4.169
同住	1.932	.202	91.348	1	.000	6.902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1.414	.104	185.312	1	.000	4.111
常量	-4.668	.587	63.169	1	.000	.009

f. 在步骤 6 中输入的变量: 老年人收入。

当老年人收入这个变量进入方程中之后,程序会自动检查老年人收入变量的进入是否使得模型变得不显著了。对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子女数量、老年人年龄和老年人收入变量进行删除检验的结果表明(见表 4.27),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子女数量、老年人年龄和老年人收入变量的移除具有显著的统计意义($p < 0.01$),这说明老年人收入变量进入模型是合适的。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性别变量、子女数量、老年人年龄和老年人收入变量在此时均未达到删除标准,因而程序还可能会继续在未加入的变量中寻找符合加入标准的变量。

表 4.27 删除项目时的模型^a

变量	模型对数似然性	在 -2 对数似然中的更改	df	更改的显著性
老年人收入	-1988.708	12.775	1	.000
老年人年龄	-1992.462	20.285	1	.000
子女数量	-1995.089	25.539	4	.000
步骤 6 子女性别	-1994.580	24.521	1	.000
居住距离	-2076.991	189.342	4	.000
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2088.280	211.920	1	.000

a. 基于条件参数估计

这时尚未进入模型的变量有：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此时，如果将现有模型外的各个变量纳入模型，没有能使整个模型的拟合优度改变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老年人性别、老年人婚姻状况、老年人健康状况、子女教育程度、子女工作情况、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的作用无统计意义（见表 4.28），因为其显著性水平 $p > 0.05$ ，不符合进入模型的标准。

表 4.28 不在方程中的变量^a

变量	得分	df	Sig.
老年人性别	.019	1	.891
老年人婚姻状况	3.411	1	.065
老年人健康状况	.258	1	.612
子女教育程度	1.980	3	.577
初中	.277	1	.599
高中中专	.440	1	.507
大专及以上学历	.142	1	.707
子女工作情况	.919	1	.338
给子女照料孩子情况	.377	1	.539
总统计量	8.210	8	.413

a. 因冗余而未计算残差卡方。

至此，按照默认模型进入标准(0.05)和删除标准(0.10)，再没有一个可加入或可删除的变量出现，逐步回归的过程到此结束。

由 SPSS 输出的最终结果来看(见表 4.26),我们以程序默认的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从方程中删除的显著性水平为 0.10 做标准,通过逐步回归得到最终模型。第六步得到的最终模型纳入了居住距离、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子女数量、子女性别、老年人年龄和老年人收入六个个变量,从它们的显著性水平看,所有自变量都是显著的($p < 0.01$),因此肯定了这些自变量的作用,而其他备选自变量均未进入方程,相应的 Logistic 回归方程为: $\text{Ln}(P/(1 - P)) = -4.668 + 0.000(\text{收入}) + 0.030(\text{年龄}) + 1.064(\text{两个子女}) + 0.729(\text{三个子女}) + 1.153(\text{四个子女}) + 0.954(\text{五个及以上子女}) + 0.388(\text{子女性}) + 1.013(\text{本省}) + 1.312(\text{本县市}) + 1.428(\text{本乡镇}) + 1.932(\text{同住}) + 1.414(\text{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

由回归方程我们发现,除常数项外,所有偏回归系数都是正值,这说明一个自变量在控制其他自变量情况下对 $\text{logit}p$ 均具有单独正向作用。

由 SPSS 最终结果的发生比率可知(见表 4.26):

从收入上看,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收入不同的老年人,其获得的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加 1 元,其代际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优势比将是原来的 1.000 倍。这证实了假设 1:经济资源越多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从孩子那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

从年龄上看,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年龄不同的老年人,其获得的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老年人的年龄每增加 1 岁,其代际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优势比将是原来的 1.031 倍。这部分证实了假设 4:需求较大的老年人(年龄较大的)更容易从他们的孩子那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但是从分析来看,老年人的性别、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对其代际支持的获得并没有影响。

从子女数量上来看,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拥有子女数量不同的老年人,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独生子女的老人而言,有两个子女的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独生子女老人的 2.898 倍;有三个子女的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独生子女老人的 2.073 倍;有四个子女的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独生子女老人的 3.168 倍;有五个及以上子女的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独生子女老人的 2.597 倍。这证实了假设 5:有更多的孩子的老年人比那些拥有更少孩子的老年人更有可能得到帮助。

从子女性别上来看,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子女性别不同,给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

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儿子,女儿给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优势比是儿子的 1.474 倍。这证实了假设 7: 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为父母提供实日常生活的帮助。

从居住距离上来看,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与父母居住距离不同,其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省外的子女,住在本省的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省外子女的 2.753 倍;相对于省外的子女,本县市的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省外子女的 3.713 倍;相对于省外的子女,本乡镇的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省外子女的 4.169 倍;相对于省外的子女,同住的子女为老年人提供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省外子女的 6.902 倍。这证实了假设 6: 与父母住的近的孩子更有可能给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的帮助。

从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上来看, 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 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情况不同的老年人,其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情况也不同。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相对于没有给与子女提供家务支持的老人而言,给与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年人获得代际支持的优势比是没有给与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支持的老年人的 4.111 倍。这证实了假设 2: 给子女提供家务支持的老年人更有可能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在研究过程当中,没有发现给子女照料孩子会对老年人获得日常生活照料支持产生影响。假设 3 没有被证实。

第五章 结论

第一节 结论

通过相关关系和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回归分析,本文从父母与子女两个方面,支持的获得与给及两个方面同时考虑,探讨了当代家庭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影响因素。检验了社会交换假设和合作社/互助理论假设本研究的主要的结论如下:

第一,那些年龄较大的人比较容易获得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这与一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李树茁,宋璐 2011);由于年龄增长,老年人在身体上和生活上对他人照料依赖的需求增加,而子女正是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主要提供者,这一点也证实了合作社/利他主义假设,家庭成员总会给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帮助;第二,那些收入较多的老年人也较其他人获得代际支持的概率较大,这一点证实了社会交换论的假设,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确实存在着即时性的交换行为;第三,拥有较多的孩子的数量,意味着老人在年老时,有较多的的可用资源,确实能够获得比较充裕的家庭养老资源;第四,变量子女性别显示,女孩比男孩更有可能给父母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支持支持。第五,居住距离显示,居住距离越近越倾向于给父母提供支持,这是由于地理上的邻近,更有利于子女给与老年人日常生活上的照顾;第六,研究结果显示老年人是否给子女提供日常生活照料的帮助,与他们获得支持是有影响的,帮助子女的老人也更有可能从子女那得到支持。

研究发现:代际支持的重心并没有发生变化,代际关系中仍然是以子女支持老年父母为主,代际间的关系是并不是单纯的交换关系,也不是单一的合作互的关系,而是二者并存的关系。这意味着,在当代家庭中,子女为老年人提供的代际支持,与传统的子女赡养老人的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在子女与老人的代际关系中,除了有合作社/互助理论关注到的家庭成员的情感因素,强调利他主义的原则外,代际关系确实存在一定的理性的交换色彩,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郭于华,2002;熊跃根,1999)。这也说明了单纯用两种理论中的任何一种解释家庭代际关系和互动行为,都有不足之处,将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这是因为合作社/互助模式更多地关注家庭代际纵向关系的传递和反馈,但其没有将同一时期代际之间的关系方式涵盖进去。交换模式则偏重于代际之间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关系,而忽视了代际互动关系的传承性、延续性和异时特征。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文主要探讨了老年人的需求及所拥有资源和子女提供支持的能力等因素对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影响作用。从研究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本研究已经达成了预期的目的。但是,要深刻揭示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关系,解释老年人日常生活照料支持获得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本研究对于家庭代际支持的探讨只考虑了一个方面,代际支持还包括经济支持和情感慰藉,但限于资料有限这是研究中没有进行考虑的。

对于代际支持的考量还可以采用纵贯数据进行研究,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本研究只采用了横截面数据,这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和弥补的。

参考文献

- [1]李嘉羽:《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12(3)
- [2]宋璐,李树茁:《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0(02)
- [3]高建新,李树茁:《农村家庭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研究》[J].人口学刊,2012(02)
- [4]姚远:《血亲价值论——对中国家庭养老机制的理论探讨》[J].中国人口科学,2002(06)
- [5]费孝通:《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03)
- [6]刘爱玉,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3)
- [7]边馥琴,约翰·罗根:《中美家庭代际关系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1(02)
- [8]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03)
- [9]陈皆明:《投资与赡养——关于城市居民代际交换的因果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06)
- [10]刘爱玉,杨善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老年人家庭支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0(03)
- [11]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人口研究,2011(01)
- [12]张文娟,李树茁:《代际支持对高龄老人身心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1(02)
- [13]高建新,李树茁,左冬梅:《子女分工方式对农村老年人获得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1(06)
- [14]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的纵向影响》[J].人口与经济,2011(02)
- [15]高建新,李树茁:《农村家庭子女养老行为的示范作用研究》[J].人口学刊,2012(01)
- [16]张震:《家庭代际支持对中国高龄老人死亡率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2(09)
- [17]王萍,高蓓:《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J].人口学刊,2011(03)
- [18]宋璐,李树茁:《照料留守孙子女对农村老年人养老支持的影响研究》[J].人口学刊,2010(02)
- [19]张文娟,李树茁:《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支持研究——运用指数混合模型验证合作群体理论》[J].统计研究,2004(05)
- [20]宋璐,李树茁:《代际交换对中国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性别差异的纵向研究》[J].妇女研究论丛,2006(04)
- [21]张文娟:《成年子女的流动对其经济支持行为的影响分析》[J].人口研究,2012(05)
- [22]左冬梅,李树茁:《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J].公共管理学报,2011(02)
- [23]李嘉羽:《城市空巢老人生活质量研究》[J].人口学刊,2012(03)
- [24]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应用心理研究,1999(04)

- [25]杨菊华,李路路:代际互动与家庭凝聚力——东亚国家和地区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03)
- [26]谢桂华:《老人的居住模式与子女的赡养行为》[J].社会,2009(05)
- [27]车茂娟:《中国家庭养育关系中的“逆反哺模式”》[J].人口学刊,1990(04)
- [28]贺雪峰:《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J].社会科学研究,2009(05)
- [29]刘桂莉:《眼泪为什么往下流?——转型期家庭代际关系倾斜问题探析》[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06)
- [30]郭于华:《代际关系中的公平逻辑及其变迁——对河北农村养老事件的分析》[J].中国学术,2001(04)
- [31]陈柏峰:《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对湖北京山农村的实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9(04)
- [32]贺雪峰:《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从“操心”说起》[J].古今农业,2007(04)
- [33]熊跃根:《中国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与老人照顾》[J].中国人口科学,1998(06)
- [34]郭志刚:《老年人家庭的代际经济流动分析》[J].中国老年学杂志,1996(05)
- [35]陈功,郭志刚:《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流动类型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01)
- [36]徐勤:《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往调查》[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01)
- [37]王世斌,申群喜,余风:《农村养老中的代际关系分析——基于广东省25个村的调查》[J].社会主义研究,2009(03)
- [38]费孝通:《三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03)
- [39]洪彩华:《试从“反哺”与“接力”看中西亲子关系》[J].伦理学研究,2007(02)
- [40]胡仕勇,刘俊杰:《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状况与对策》[J].农村经济,2013(03)
- [41]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J].人口研究,1998(04)
- [42]张文娟,李树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9(09)
- [43]张文娟,李树茁:《农村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C],第四届华裔老年人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年
- [44]涂诗意:《山东省农村老年人口高血压患病和控制的经济社会差异研究》[D],山东大学,2009年5月
- [45]范成杰:代际失调论:对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问题的一种解[D].华中科技大学,2009(05)
- [46]温勇,尹勤:《人口统计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
- [47]刘汶蓉:《反馈模式的延续与变迁:一项对当代家庭代际支持失衡的再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08)
- [48]熊跃根:《需要、互惠和责任分担——中国城市老人照顾的政策与实践》[M].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07)
- [49]宋璐,李树茁:《当代农村家庭养老性别分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02)
- [50]康岚:《反馈模式的变迁:转型时期城市亲子关系研究》[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09)
- [51]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 [52]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年

- [53]王树新:《社会变革与代际关系研究》[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
- [54]邓伟志主编:《社会学辞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
- [55]杨菊华:《社会统计分析 with 数据处理技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56]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 [57]王济川,郭志刚:《Logistic 回归模型——方法与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
- [58]吴晓刚主编:《数据分析方法五种》[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59]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 软件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 [60]薛薇:《统计分析与 spss 的应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 [61]曾毅:《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0年
- [62]鄧玉玲:《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老龄问题研究》[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
- [63]沈崇麟,李东山,赵峰:《变迁中的城乡家庭》[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09)
- [64](美)安·A.奥康奈尔著,赵亮员译:《定序因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 [65]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 [66]Donald Cox. Motives for Private Income Transfer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7,95(3):508—546.
- [67]Gary S.Becker.A Theory of Social Interaction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4 82(6):1063—1093.
- [68]Whyte,M.King(1997).The Fate of Filial Obligation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38:1-31.
- [69] Zimmer,Z. & Kwong, J.(2003). 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 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 *Demography*,40(1):23-44
- [70]Fuqin Bian, John R. Logan and Yanjie Bia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in Urban China: Proximity, Contact, and Help to Parents, *Demography*, 1998,35(1):115-124
- [71]Mogan,P.S.& K.Hirosima.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3 (48): 269-281
- [72]Lillard,L.A. & R.J.Willis. Motives for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Demography*.1997: (115-134)
- [73]Mogan, P.S.and K.Hirosima.The persistence of extended family residence in Japan.*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3 (48):269-281
- [74]Daniela Klaus.Why Do Adult Children Support Their Parents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2009(40) :227
- [75]Aafke Komter and DjamilaSchans.Reciprocity Revisited:Give and Take in Dutch and Immigrant Families.*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2008 (39): 279
- [76]Mahmoud Ghazi-Tabatabaei,Zeinab Karimi.Economic and Structural Correlates of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of the Elderly in Iran. *Socio-demographic*.2011(36):428-444.
- [77]Beate Schwarz,Gisela Trommsdorff,Gang Zheng and Shaohua Shi.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A Comparison of Chinese and German Adult Daughters.*Journal of Family Issues*.2010(31):234-256
- [78]David C. Ribara,Mark O.Wilhelmb.Exchange,role modeling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 transmission of elder support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ree generations of Mexican-Americans. *The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6 (35): 514–531
- [79]Dan Bahadur Baidwar Kshetri, Cairns S. Smith² & Mira Khadka.Social care and support for elderly men and women in an urban and a rural area of Nepal.*The Aging Male*. 2012 (15): 148–152
- [80]Cornelia Wrzusi,Jenny Wagner,Anna Baumert,Franz J.Neyer and Frieder R.Lang.Adult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Through the Lens of Social Relations Analyses:Prosocial Personality and Reciprocity of Supporty.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011.(25): 133–145
- [81]Lois M. Verbrugge , Aagelique Chan.Giving help in return: family reciprocity by older Singaporeans.*Ageing and Society*:2008 (28):pp5-34
- [82]Zachary Zimmer, Julia Kwon.Family size and support of older adults in urban and rural China:current effects and future implications.*Demography*.2003(40): 23–44
- [83]Schwarz Beate and Gisela Trommsdorff.The 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2005(2):192 - 199
- [84]Hongqiu Yang.The distributive norm of monetary support to older parents:a look at a township in China.*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1996(58)
- [85]Lei Lei.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2013(45):26-52
- [86]Merril Silverstein,Vern L. Bengtson.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nd the Structure of Adult Child–Parent Relationships in American Famil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97(103):429-60
- [87]Roger Paden. Reciproc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996(10):249-266
- [88]Juping Lin, Chin Chun Yi.Filial norm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o aging parents in China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2011(20):109-120
- [89]Baozhen Luo , Heying Zhan. Filial Piety and Functional Support: Understanding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Among Families with Migrated Children in Rural China. *Ageing Int*. 2012 (37):69–92
- [90]Manasi Bawdekar ,Laishram Ladusingh. Intergenerational time and monetary support among urban Indian families.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2012(8):1744-1749
- [91]Jenny de Jong Gierveld ,Pearl A. Dykstra, Niels Schenk. Living arrangement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types and older adult loneliness in Eastern and Western Europe. *Demographic Research*.2012(27):167-200
- [92]Leen Heylen,Dimitri Mortelmans,Maarten Hermans,Kim Boudiny. The intermediate effect of geographic proximity 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A comparison of France and Bulgaria. *Demographic Research*.2012(27):455-486
- [93]Beate Schwarz Æ Gisela Trommsdorff. The 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Eur J Ageing* .2005(2): 192–199
- [94]David J. Eggebee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s . *Research on Aging*. 1992 14: 427
- [95]Rongjun Sun. Old Age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 from Both Parents' and Children's Perspectives. *Research on Aging*. 2002 24: 337
- [96]Alvin W. Gouldner. The Norm of Reciprocity: A Preliminary State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0(25):161-178

[97]Richard M. Emerson.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1976(2):335-362

[98]George C.Homans.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58, 6:597 —606.

[99]Goode,W.J.“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1963.

学术成果

- 1、《校园流行歌曲中的时代特征分析》发表于《消费导刊》2012年第5期
- 2、《言语交际中的性别差异及原因》发表于《青年文学家》2012年第13期

致 谢

我的论文从选题到写作完成,历时将近一年。其间修修改改好多次,现在终于要告一段落了,感到颇为高兴。回首三年来的校园生活,调研相伴的岁月,虽然辛苦但是充实有趣,让我在期间无论是学识上还是待人接物上都受益颇丰。我的学术之旅直接受惠于我的导师冯世平副教授。导师博学、审问、慎思、笃行,在充满学术气息的一言一行中,无不渗透着对学生的关爱和严谨的学术启迪。本论文的完成离不开诸多师友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冯世平副教授,导师为我的论文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数据资料,并在论文的很多方面给予启发,与他每次的交流过程中使我明晰了研究框架和分析的逻辑。在本研究的具体细节方面,老师也给予很多指导,特别是数据处理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时,老师的热情帮助,悉心教导,使我不甚感激。

衷心感谢陈文江,黄少华,张咏梅,牛芳,焦若水等老师带给我们的每一堂精彩的专业课,拓宽了我的视野提升了我的专业素养,也感谢他们在论文开题时给我的指导、点拨,诸位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促进了我对研究问题的思考,使我的选题和研究设计更加合理。

论文修改阶段,同门师弟师妹给我提出的意见,给我在论文的逻辑与行文方面以启发,使得我的论文更加严谨。与他们共同度过的快乐时光我将铭记在心,愿我们在今后的人生中一如既往,相互砥砺,携手共进。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宽容与理解,使我获得源源不断的奋斗动力和信心。

尚梦媛

2014年5月于兰州大学